

彭康文集

(下卷)

《彭康文集》编辑委员会 编

康在華北之教育事業，其影響之深遠，
非僅限於當時之北平，而遍及於全國。
此是當時之一般情形，茲就其在華北之
教育事業，略加敘述。
康在華北之教育事業，其影響之深遠，
非僅限於當時之北平，而遍及於全國。
此是當時之一般情形，茲就其在華北之
教育事業，略加敘述。



清华大学出版社

彭康文集

(下卷)

夏征农

《彭康文集》编辑委员会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目录

下卷

1937—1965年

- 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1937年11月3日）/ 001
- 全面抗战中目前几个紧迫问题（1937年11月6日）/ 006
- 抗战与文化（1937年11月12日）/ 013
- 抗战的胜利就是革命的胜利（1937年11月21日）/ 016
- 关于安徽工作给秦邦宪的报告（1938年6月12日）/ 022
- 关于安徽党的组织和武装工作等情况致秦邦宪信（1938年7月3日）/ 027
- 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1941年4月）/ 032
- 在学习问题上的党性锻炼（1941年）/ 042
- 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1942年5月14日）/ 051
- 党性问题（1943年9月7日）/ 056
- 论主观主义（1943年）/ 067
- 中共中央华中局党校整风报告（1944年4月5日）/ 071
- 反对主观主义（1944年9月20日）/ 095
- 关于华中局党校审干经验的报告（1944年11月15日）/ 104
- 华中建设大学第一期招生简章（1945年1月）/ 110
- 华中建设大学第二期招生简章（1945年9月）/ 112
- 致杨素同志的信（1946年8月2日）/ 114

思想方法问题 (1946 年) / 115

在华中建设大学第三期开学典礼上的致辞 (1946 年 12 月 11 日) / 127

在华中建设大学第三期开学典礼上的时事报告

(1946 年 12 月 11 日) / 128

在华中建设大学第四期开学典礼上的时事报告

(1947 年 7 月 1 日) / 131

目前宣传教育工作的几个问题 (1947 年 5 月 21 日) / 133

克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 保证党的领导统一 (1948 年 7 月 1 日) / 141

报纸工作要克服经验主义 (1948 年 8 月 7 日) / 146

反对经验主义 (1948 年 11 月 1 日) / 148

加强共产主义与国际主义的教育 (1948 年 11 月 7 日) / 154

泛论政局 (1949 年 2 月 2 日) / 160

做好新形势下的妇女工作 (1949 年 7 月 23 日) / 163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青年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49 年 8 月) / 171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教工作情况 (1949 年 8 月) / 180

努力做好城市的党的建设工作 (1949 年 10 月 30 日) / 190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宣传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1949 年 11 月 24 日) / 205

为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二部毕业生的题词 (1950 年 2 月 9 日) / 237

在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二部结业典礼上的讲话

(1950 年 2 月 11 日) / 238

在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县团级以上干部大会上的时事报告

(1950 年 11 月 22 日) / 241

新山东大学将成为全国最完备的大学 (1950 年 12 月 23 日) / 256

在山东省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致辞 (1951 年 4 月 22 日) / 258

认清我们工作取得的成绩 (1951 年 5 月 27 日) / 260

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 (1951年6月22日) /	264
关于执行“六一号召”的情况报告 (1951年9月27日) /	269
谈谈当前文化教育工作的三个问题 (1951年下半年) /	275
关于共产党员的党性问题 (1952年6月14日) /	283
提高党的宣传工作的思想性 (1952年7月30日) /	300
关于加强交通大学校刊工作的决定 (1953年7月1日) /	311
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建立新的文化艺术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文化艺术观感 (1953年7月12日) /	313
为交通大学 1953 届毕业生的题词 (1953年8月11日) /	319
以更多的工作成绩来迎接 1954 年 (1954年1月1日) /	320
对交大内燃机教研室成立“内燃机构造与计算教本编辑委员会” 报告的批示 (1955年1月21日) /	322
在中国共产党交通大学第一次党员大会上的报告 (1955年1月28日) /	324
认真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1955年3月22日) /	334
对交通大学 1955 届毕业生决心书的批语 (1955年8月25日) /	338
致教育部长杨秀峰的信 (1956年3月7日) /	339
在中国共产党交通大学第二次党员大会开幕式上的工作报告 (1956年3月24日) /	341
在中国共产党交通大学第二次党员大会闭幕式上的总结报告 (1956年3月25日) /	350
在交通大学 60 周年校庆大会上的报告 (1956年4月6日) /	354
为南洋工学院设置专业事给舒文的复信 (1957年6月17日) /	357
就交通大学迁校问题发表的个人意见 (1957年6月20日) /	358
就迁校问题向交通大学 (西安部分) 师生所做的报告 (1957年7月9日) /	364

在交通大学（上海部分）、上海造船学院、南洋工学院（筹）

三校合并大会上的讲话（1957年9月7日）/372

交通大学整风整改工作的阶段总结（1958年1月15日）/374

在关于两类社会矛盾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1958年2月22日）/382

在中国共产党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党员大会闭幕式上的总结报告

（1958年4月9日）/384

体育锻炼必须开展普遍的群众性运动（1958年3月8日）/390

辩证地看待理论与实践相结合（1958年5月8日）/392

使我校飞快成为具有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工业大学

（1958年6月23日）/394

我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坚决抗议和谴责美英侵略罪行

（1958年7月19日）/397

在上海交通大学师生欢送彭康、欢迎谢邦治大会上的讲话

（1959年9月5日）/400

切实抓好培养学生的工作（1960年）/402

关于教学质量和调查研究（1961年4月18日）/404

青年工作要活跃（1961年4月19日）/407

提高教学质量的几个重要关系（1961年4月29日）/409

关于师资培养问题（1961年5月26日）/414

在西安交通大学1961届毕业生大会上的讲话（1961年6月9日）/423

如何坚持“双百方针”（1961年6月10日）/426

在西安交通大学第三次工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61年6月17日）/431

学习和贯彻《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

（1961年11月7日）/435

在西安交通大学1962级新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1962年9月1日）/443

青年学生要提高道德品质与修养 (1962 年 10 月 24 日) /	446
在西安交大工程物理系党员大会上的讲话 (1963 年 2 月 26 日) /	450
师资培训工作的方针与方法 (1963 年 5 月 10 日) /	452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史上的伟大革命 (1963 年 6 月) /	458
正确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技术人才 (1963 年 11 月 13 日) /	466
在听取教学工作汇报时的讲话 (1965 年 2 月 22 日) /	470
加强科学研究工作的几点意见 (1965 年 5 月 19 日) /	473
关于教学改革工作 (1965 年 6 月 26 日) /	480
在西安交通大学 1965 届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1965 年 8 月 7 日) /	490

附录

1. 彭康自传 (1955 年) / 492
2. 彭康年谱 / 498

后记 / 531

孙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

(1937年11月3日)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国民革命的伟大的领导者，他创立了民族解放、民主权利和民生幸福的革命的三民主义，制订了联俄、联共和农工政策的实行的三大政策。因为有了这三大政策，才发动了1925—1927年的伟大的国民革命，才使北伐得以成功。在现在展开了对日帝国主义者的全面抗战的时候，尤其有彻底实行这三大政策的必要，且更有其特殊的内容，而我们也更觉得中山先生思想的深邃和目光的远大。

中山先生之所以有这样的思想，自然有其来源和哲学的根据，他的思想是随着时代进步的，依据客观现象而充实其内容的。他最初只标榜着排满，进而主张民权，更进而认识了要人民在政治上平等，必须同时在经济上也要平等，因此便订定了民族、民权、民生的三大原则。更积了40年的经验，深知欲求中国之自由平等，“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因此又订定了正确的三大政策。

可惜时间不允许他专从事于哲学的研究，不曾留下一个整个的系统，

^{*} 本文原载《战斗旬刊》第一卷第六期，1937年11月8日出版。署名：子之。

以致一般人对于他的哲学有种种不同的认识和解释。有人说他的哲学是唯心的，有的说是唯物的，更有的说是唯生的。但客观地研究起来，觉得他的思想的骨干是唯物的，因为系统不完整，当中包含了许多唯心的要素。

他知道“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物质与精神是根本的现象，则除此以外，一切都是派生的。所谓“生”，就不是什么根本现象，更无所谓“唯生论”了。这里包含着二元论的倾向，但进一步研究什么是精神，什么是物质，则唯物论的色彩便很明显了。

“在中国学者，亦皆恒言有体有用，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譬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皆为体，属于物质；其能言语动作者，即为用，由人之精神之为一”（《军人精神教育》）。体是本体，是主体；用是作用；须先有体，然后才有用，须先有五官百骸，然后才有言语动作，即说须先有物质，然后才有精神，这不是很明显的唯物论吗？不过他以为“精神虽为物质之对，但非绝对分离，二者实相辅为用，本合为一”，对于物质与精神的关系，还保持着平行的见解，如果根据上面的思想再进一步，就可以达到物质是主，精神是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物质底作用这个认识了。

从上面看来，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的根本倾向是唯物的，所以如果只根据“生元”这两个字，便说是“唯生论”，就未免是曲解了。《孙文学说》里面说：

“据最近科学家所考得者，则造成人类及动植物者，乃生物之元子为之也。生物之元子学者，多译之为细胞，而作者今特创名之曰生元，盖取生物元始之意也。”

这很明白地说，生元只是细胞，而细胞只是生物的组织单位。如果把这生元认为是宇宙的本体，世界是由这本体组成起来的，因而说这是唯生的宇宙观。其实，这也不过是把原子改为生元，仍是原子论的旧套，或者只是把整个的世界局限于生物界，而以生元为其单位。这都只是断章取义

的独断，决不是中山先生的本来思想。

中山先生根据他的哲学又发展了他的历史观。历史是人类创造的，人类要维持其生存，就必须获得生活资料，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人类要获得生活资料，就必须有种种的活动，以这活动为中心，还有其他种种的活动，这也是很明白的事实。中山先生很清楚知道这些道理和事实，所以他说：

“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主义》）。

“民生就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所以社会各种变态都是果，民生问题才是因”（同上）。

这就是一般人所谓的民生史观了。这民生史观当然不是唯心史观，但是否是与生物史观独立，或甚至相反的呢？我们先看什么是民生？

“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同上）。

所谓生活、生存、生计和生命，都是人类的生活。总括说，都是人类社会的生活。人类的社会生活是很广泛的，如果这里所谓的民生是指整个的社会生活，那就等于说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重心，这就毫无意义了。问题是要在整个社会生活中，以某种特殊生活为整个社会生活即历史的重心，即是说以某种特殊活动为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这特殊生活是什么呢？

“民生的需要，从前经济学家都说是衣食住三种，照我的研究，应该有四种，于衣食住之外还有一种，就是行。行也是一种很重要的需要，行就是走路。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够享受”（同上）。

民生就是衣食住行，民生是历史的重心，所以衣食住行是历史的重心。衣食住行不就是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吗？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中山先生的历史观，决不是唯心史观，也不只是空洞的、抽象的民生史观，而是

以经济生活为具体内容的“民生”史观。这样的史观，很明显地，不但不与唯物史观相反，而且很相接近。衣食住行是民生所需要的经济生活，可是怎样来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怎样来获得这衣食住行的资料呢？民生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即衣食住行的需要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因而解决这问题的方法和获得这资料的方式是一切社会活动的原动力了。

中山先生不但有这样接近真理的历史观，而且有对于历史未来的、真挚的理想。他说，“要完全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解决生产问题，就是分配问题也是要同时注重”；“我们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要财源分配得平均，自然要取消人对人的剥削和压迫，要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社会。所以他说：

“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同上）。

既有这样的理想，就一定要有实现此理想之手段，尤其要人人有不屈不挠的精神，不畏艰难的勇气。但徒有精神和勇气的行动还是盲目的，必须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强的意志，然后才能有正确的行动。没有正确的理论，便没有正确的行动，所以正确理论的获得是重要而且困难的，中山先生的知难行易说也是这个意思。“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是中国的古训，是要勉人努力去行，不要只是知了就算了事。但因此使人存一种畏难不进之心，以知为易，以行为难，不轻易去行，甚至根本就不行。所以王阳明主张要知行合一，“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终”，只是知，不是完知；只是行，不是完行。但这还有知易行难的观念，强调行的重要，而略了知的积极性。中山先生反对这种知易行难的传统，主张知难行易的学说，以为知是最难的，因“不知亦能行”，并不一定有了才能行动。但一有了知则更能行动，所以“能知必能行”。

中山先生把知行关系分为三种，即“不知而行”“行而后知”“知而后行”。知后的行自然是正确的、进步的，但我们不能只片面地强调知的困难和重要，还应充分地考虑到知行的相互关系和作用，即理论与实践的统

一。行要知来指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即没有革命的实践；知要在行动中来形成，不是由实践当中产生出来的理论是空洞抽象的理论。有了正确的认识便能有坚强的意志，更能有勇敢的行动，因而能达到目的。所以中山先生说“有志竟成”，“吾心信其可行，则移山填海之难，总有成功之日。吾心信其不可行，则反掌折枝之易，亦无收效之期也”。

中山先生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坚忍奋斗的意志，远大的目光，深邃的思想，终于使他能定订三大原则和三大政策而成为伟大的领袖。而其所以能如此，是在他能顺应客观环境。随着时代进步，我终相信如果他还健在的话，他的思想一定会发展到现在最进步的、最科学的世界观和历史观。

全面抗战中目前几个紧迫问题^{*}

(1937年11月6日)

伟大的神圣的民族解放战争，从开始到现在，已经两个多月了。在这两个月当中，我们虽然有过局部的失败，虽然有些地方被占领，但我们英勇的将佐士兵拼着血与肉，却获得了许多光荣的胜利。这些胜利，不但粉碎了“恐日病”与“唯武器论”，不但使敌人受到了莫大的损失与巨创，而且给全世界证明了中华民族团结的伟大力量，中华民族为求生存而奋斗的决心，这些力量和决心，又获得了全世界的同情和钦佩。

这次抗战，是要和残暴的日本帝国主义者拼命的，当中是需要持久的耐力和坚强的决心的，是要经过这许多的困难和牺牲的。困难是要克服的，必要的牺牲也是要忍受的，但要使这持久战得到胜利且能保持这胜利，那就不但军事上的布置是重要，外交上及政治上的布置同样的是重要。目前为要使这持久的全面的抗战能够胜利地展开，几个紧急的问题是迫切地需要解决。

^{*} 本文原载《新学识》第二卷第三期，1937年11月11日出版。

一、对日绝交

中日两国因为“不宣而战”，所以事实上的战争已经存在两个多月了，而两国的国交仍维持常态，两国的大使仍逗留在事实上的敌国。这是一种畸形的现象，这现象是有利于敌人，而不利于我们的。残暴的日帝国主义者用最残忍的手段进行其侵略的行为，可是自己却不愿担负这发动战争的责任，所以既“不宣而战”，同时也没有而且也不愿意施行交战国通常应有的行为，如断绝国交，废除条约，没收财产及禁止通商等。这不但在表面上可以掩饰其侵略的暴行，而说这只是局部的战争，以致不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激。事实上，中日两国间有的只是于暴日有利的不平等条约。它自己还要尽力地维持，为什么要废除呢？没收财产吧，它在中国有大量的投资，大批的工厂，巨大的银行以及其他财产，而中国华侨在日本的财产和这个比较起来，是差得远得很。如果要没收的话，不是叫人来没收它自己的财产吗？至于通商呢，暴日对中国的贸易有怎样的地位，在它的商业和经济中有怎样的意义，是谁都知道的。如果不是战争状态使通商陷于不可能的话，它会禁止吗？不然，它为什么要强迫我们停止排斥日货呢？

暴日之所以不绝交，不即施行交战国所有的行为，不但有上述的那样事实上的利益，不但足以影响国际视听，还有一个最大的利益而对于中国却是最大的危险，就是它想藉此来动摇我们抗战的决心，使抗战不能持久，而从中获取于它有利的妥协。

暴日的这个阴险是最毒辣的，这个前途是最危险的。但不幸的是，我们自己内部却并非没有走向这前途的可能的因素。谁都知道，过去主和的一部分人及亲日派仍旧在政府中占着地位，而且在对于抗战认识不清和动摇不定的人们当中还有其影响，在某种条件之下，和平妥协的主张又会抬

头的。

和平妥协论者，以为只要对暴日给以相当的让步，便可以获得暴日的谅解，停止对我们的进攻。其实这是做梦，疯狂的日帝国主义者企图侵占整个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的野心还不够明显吗？侵占了我们的东北，抢夺了我们的平津，霸占了我们的察绥淞沪一带的炮火，后方各地的轰炸，使我们的人力物力受了极大的损失，这还不够凶横残暴吗？我们是为生存而抗战，不抗战要做亡国奴，便是死。如果不愿做亡国奴，那就只有抗战到底，绝没有妥协的可能。

蒋委员长说：“战争一开始，便要奋战到底，极不容中途有任何妥协，如果中途妥协，便是整个的投降！”我们“要奋战到底”，我们反对“中途妥协”，反对“整个的投降！”为要使这次持久的全面的抗战不受到阻碍，能够胜利地展开我们主张：即时对日绝交，没收暴日在华的一切财产，废除中日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方面堵塞中途妥协的一切可能性，一方面表示中华民族为求生存而抗战的决心，以获得国际上的同情和帮助。

二、订立中苏互助协定

为要使抗战得到胜利，主观的力量和一切的准备自不待说，一切有利于我的国际关系和实际能帮助我们的友邦也极重要。我们并不，而且也不可专靠外力，但要维持和平，抵抗侵略，却非和爱护和平反对侵略的国家联合不可。何况中国现正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以血与肉来求自由解放的时候，更非执行中山先生积四十年之经验所定下的国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不可。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是走向这国策的第一步。因这条约的缔结，

使一般民众明了抗战中的政府的外交方向，表示了政府在外交方面已有了独立自主的政策，不再会受日帝国主义者的威逼或中其挑拨离间。又因这条约的缔结，仍如外部发言人所说“此举不但对中苏两国间之和平多加一重保障，且为太平洋各国以不侵犯之保证，共谋安全之嚆矢”，成为太平洋集体安全制度的发端，使太平洋形势的发展陷侵略者于孤立的地位而增强反侵略者的助力。但我们认为只是这样还不够，应该还要进一步来充实抵抗侵略的实力，谋制裁侵略者的有效方法。

苏联，谁都知道是和平政策的支柱，世界被压迫民族的友人，同时也是日德意法西斯同盟的进攻目标。它不但要帮被压迫民族来抵抗侵略的帝国主义者，同时还要保卫它自己，在帮助被压迫民族的当中来保卫自己，在保卫自己的当中来帮助被压迫民族。帮助他人与保卫自己，形成了一个不可分离的联结，这尤其表现在对中国的关系上。

日本帝国主义者现正在以最厉害的武器和最残忍的手段实行它的大陆政策。现已抢夺了东北，侵占了华北，如果不给以严重的打击，驱逐出中国领土以外，收复我们的失地，则中国将成为进攻苏联的根据地，疯狂的日德意法西斯同盟要大兴其征苏十字军了。所以这次对日的抗战，不但是中国的生死存亡的关头，即与苏联也有密切的利害关系。

这样，苏联不但根据它的维持和平反抗侵略的国策，及扶助弱小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以进于大同世界的主义，它会帮助中国对暴日的抗战；即从它自己的利害关系上，它也不得不帮助中国来打倒共同的敌人。

为着要使抗战能够顺利地展开而获得最后的胜利，为着要减少敌人的力量，增厚自己的力量，所以我们以为，应立即从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进一步地订立中苏互助协定。

或许有人会以为订立了中苏互助协定，便会减少了对英美的友谊，失去了它们的帮助。其实不然。我们的互助协定并不是像军事同盟一样，为着要侵略人家而找一个帮凶；我们是要维持和平，抵抗侵略，保卫自己。

而且互助协定并不拒绝他国的参加，英美如果也有进一步地裁制破坏和平、妄肆侵略者的决心，也可以而且当然应该加入。事实上，互助协定能予暴日以打击，使中国能恢复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对于英美也是有利的。所以英美只应欢迎这维持和平最有力的手段，决不会因此而减少对中国的友谊。法苏、苏捷的互助协定并没有阻碍到法捷与英美间的友好关系，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如果说中苏互助协定会使德意走向日本这方面而增加日本的力量，这就没有认识到德意日法西斯蒂本来就是横蛮的侵略者，世界和平的扰乱者，本来就是侵略阵线中的三主角，现在又已订立了三国的防共协定了。我们用不着顾虑，应独立自主地找寻我们自己的友人。如果它们反对的话，那么日帝国主义者现在是我们的敌人，它们为什么又可以订立协定呢？

总之，互助政府是集体安全制度下抵抗侵略的有力工具，是中国对暴日抗战获得胜利的有力保障，我们应立即签订。

三、施行民主政治，发动民众运动

中国民族独立解放的抗日战争是一个极艰难困苦战争，暴日帝国主义者是一个极残忍横蛮的敌人。我们要达到最后的胜利，要完成神圣的使命，决不是少数人可能做到，决不是某特殊阶层可能担负，更决不是单独的军事力量所能完成。必须全国各党、各派、各阶层一致团结起来，联合成牢固的统一阵线，必须全国民众都组织起来，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与军事打成一片。必须这样，才能抵抗暴日，才能有胜利的保障。

可是不容讳言，发动抗战已经这样久了，许多应做的事还没有做，政治的、经济的、民众的动员还不能和军事的动员配合起来。“脱节”的现